

解读



沈从文 经典

旷新年 主编



丛书顾问

丛书主编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上海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著名专家学者
领衔编写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冕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洪子诚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花山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丛书主编：程光炜

解 读

沈从文

经 典

主 编：旷新年
撰 稿：旷新年 苏七七
陈宇航 乐 颜
米向阳 温海墨
张 昕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解读沈从文经典/沈从文原著;旷新年主编. —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程光炜主编)
ISBN 7-80673-344-2

I. 解... II. ①沈... ②旷... III. 沈从文(1902~1988) — 文学欣赏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704 号

丛 书 名: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书 名: 解读沈从文经典

原 著: 沈从文

丛书主编: 程光炜

主 编: 旷新年

撰 稿: 旷新年 苏七七 陈宇航 乐 颜
米向阳 温海墨 张 昕

责任编辑: 阎 丽

责任校对: 李 伟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天泽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9 千字

印 张: 8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344-2/1·206

定 价: 1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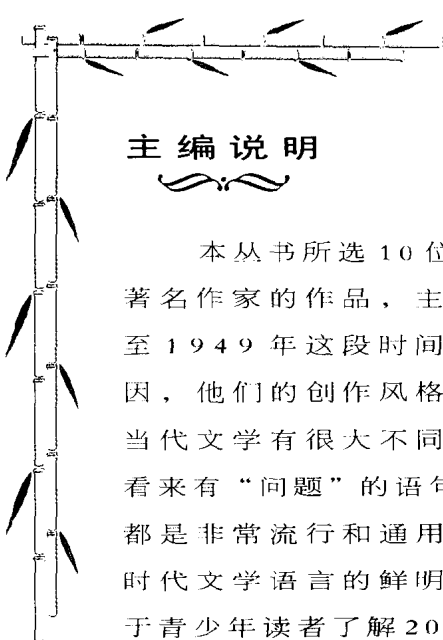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严家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谢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孔庆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旷新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刘 勇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义勤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兆胜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文学博士
王光东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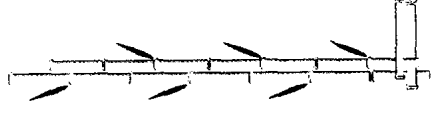
主 编 说 明



本书所选 10 位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的作品，主要发表在五四至 1949 年这段时间。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创作风格和行文方式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很多在今天看来有“问题”的语句，在当时实际都是非常流行和通用的，带有那个时代文学语言的鲜明特征。为了便于青少年读者了解 20 至 40 年代文学的语言风格和个人文字魅力，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上述作家的作品忠实历史原貌，除对个别文字及标点符号作了变动外，其余均一仍其旧，未作修订和校注，特此说明。

程光炜

2003 年 9 月



总 序

程光炜

如果从 1917 年算起，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 85 年的历史。之所以人们习惯将 1917—1949 看做现代文学的“30 年”，是因为那是一个大家、名家辈出的时代，而这一群星灿烂的情景，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虽然，在“文学”和“历史”的天平上，重量是倾斜于“历史”的，文学无可置疑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文学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历史宏大的场景及其丰富和充满矛盾的内涵，暴露出被时间掩埋的某些不便言传的细节，从而把历史的声音、形象储藏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之中，变成一种特殊的民族记忆。所以，当历史远走之后，留给“今天”的，往往是一些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那些不会“远走”的作品。我想，这也许正是我们编选丛书的一个初衷。

丛书所选的 10 位作家，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他们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显示出这一时期文学极其丰富、多样的审美形态。由于“背景”、“地域”和“人生经历”等等的不同，他们的创作所存在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因为复杂的原因，文学史、包括读者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与他们的实际成就并不一致，有些，甚至远离了他们创作的实际情况和史实。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作家的“位次”又出现了一些调整，他们的“身份”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当代人”总是按照

自己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来“挑选”作家的，他们的“文学接受”难免要打上“时代”的特殊印记。鉴于上述大的文化动向，进入我国中学课本的作家，在不同时期想必也会发生相似的“变动”和“调整”。比如，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郭沫若、朱自清、茅盾、巴金、老舍的作品占有较大的比重，鲁迅则是每书必选的作家之一。90年代后，这种格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一直被忽视、甚至不曾露面的作家，例如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人这时纷纷“登堂入室”，他们的作品不仅占去了“主流作家”长期占有的篇幅，而且愈益“抢眼”，开始拥有比较多的读者。当然，如上所说，这种情况是“时代”在另一情景下的又一“选择”，人们大可不必为之奇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文学选本，都能对当时的读者，尤其是中学生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留下特殊的“文学记忆”。文学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起到别的书写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一事实，已经被几十年来我国中学教育的历史所证实。考虑到这一情况，各位编者力图避免过去那种“倾向性”的编撰习惯，尽量选入既代表一个作家最高成就，又反映出他们创作态度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作品，无意再像以前那样“主观地”去影响、左右读者，而是给后者留下了更大、更宽阔的选择的空间，让他们按自己的眼光来挑选作家，欣赏作品。

8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教育进入了繁荣的时期。更多的青年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到大学深造的梦想。但是，由于“升学”、“就业”等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中学教育中也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高分低能，一定意义上降低了一代人的文化素质，而这种积重难返的现象，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身上表现非常明显。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它的“累积”，不仅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大学阶段的教育质量，使民族的人文教育进入一个



“低谷”，而且其负面效应，也许是无法估价的。其实，现在不光不少理工科学生在文学知识、修养上近乎“文盲”，即使有些文科生、甚至中文系学生，四年之中没有通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离婚》等作品的，也不算是什么“新闻”。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急功近利的中学课堂教学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目前大学体制“非人文化”的状况有直接关系。说到底，高中课堂的语文教学实际是一种“文学教育”，“语文教学”在本义上，不单要求学生掌握基础性的、必要的“知识”，以便适应高考，还要求学生是一个有相当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人。尤其是后者，某种程度上成为一所学校和老师的教学是否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种“判断标准”与现实状况恰好相反，有些，甚至到了令人堪忧的程度。今天看来，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对国民进行“美育”的思想的确是非常高瞻远瞩的一种识见，但显然，蔡先生所说的“美育”并不等于是“课堂教学”，它包括的范围，远远要比人们的理解更加广泛。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文学教育”是在课堂之外由学生自我完成的，它与“课堂”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要比课堂站得更高、也更远大和丰富。文学教育牵涉到学生本人的阅读、欣赏、选择等等一些方面，它是以广泛的文学阅读为基础的，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储蓄的过程，只有在读了很多的作品之后，他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其精神世界和作品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才能对同类作家和一个时期文学的总体状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体察和认识。“十年磨一剑”是一个现实比喻，然而，文学修养其实就是一个长期为之、坚持不懈的过程。同样道理，一个首先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的人，他才有可能在知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较大的优势。

本丛书聘请了国内几位有声望的学者担任顾问，他们是：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严家炎先生、谢冕先生和洪子诚先生。各位编选者，都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翘楚，如孔庆东、旷新年、刘勇、张健、张新颖、王兆胜、吴义勤、王光东等，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一些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另外，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篇目赏析文章的撰写工作，他们的“加盟”，为本丛书增添了不少亮色。值得提到的是，各书作品篇目的选择、书前导言及赏析文章，反映了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它们不光视野开阔，知识结构新颖，而且也注意在“作品赏析”之外，详细介绍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其它相关知识，充分体现了当代性、青年性、知识性和新鲜活泼的编选风格。入选的篇目，有些已经与目前的中学语文课本相连接，有些作品很少见到，有些则超出了课本范围，力图使读者在掌握基本的知识之外，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视野，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台阶上俯瞰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和发展历程。另外，在赏析文章的撰写上，我们要求做到艺术感好、叙述新颖、有较强的分析能力，要求文字上尽量贴近高中学生的欣赏口味，同时做一点适度的提升。要求它们好读、耐看，有吸引力，同时像一篇知识性的美文。如果说，读者与作品之间是一种交流的关系，那么编选者、赏析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的关系。相信通过这套丛书，广大青少年读者能和我们一起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当中，产生一种真正的心灵和艺术的对话。

最后，我特别要向几位担任顾问的学界前辈，向各位编选者和参与撰写工作的研究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沈从文的传奇

旷新年

今年是沈从文诞辰 100 周年。1988 年 5 月 10 日沈从文的辞世并没有写完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笔。

80 年代以来，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发端，“重写文学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茅盾被戏剧性地从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上赶了下去，而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曾经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秩序之外的作家，则被供奉到了“纯文学”的神坛之上，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高峰。到 20 世纪末，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了一种不可回避的阅读时尚。从文学史的被迫遗忘到“沈从文热”，沈从文的阅读史也具有了传奇的色彩。

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并称为中国两座最美丽的县城。可是，这里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历史悠久、多灾多难的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地之一。不断地起而反抗和一再地被镇压和歼除的苗族的民族历史，给这一方神秘美丽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凉色彩。沈从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对于生命的随意的处置。20 世纪中国被迫面对民族的灭顶灾难而苏醒过来，大时代的冲击也波及了这块古老、遥远、封闭和悲剧性的土地。1922 年，由于对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从文离开家乡——边陲之地的湘西前往新文学的首都北京，去寻

找生命的合理的形式和意义。

沈从文成长为著名作家之路具有传奇的色彩。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主人公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作家的领袖，从小学毕业生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他依靠写作终于跻身于他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上流社会。这是一个传奇。一个“乡下人”由于个人才华受到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音等绅士和太太的赏识，从而为绅士太太们的沙龙增添了传奇的光彩。这正是一个能够配合沙龙里恰到好处的明暗和色调的传奇。在童话中最常见而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这种奇迹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

1924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1928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随波逐流地从北京来到了上海，几乎以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平，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收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体现了沈从文以及“京派”的文学主张，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并且由对上海的作家发难，挑起了“京派”与“海派”的论战。正如沈从文自己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的那样，他的发展“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沿着“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以及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发展脉络，沈从文最终归纳为共同的流向。



沈从文本身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作品也是不同于现代现实主义主流小说的传奇。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他不是要使我们去接近现实，去“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色彩，一些音乐，一些故事，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沈从文反感现代商业文明对于乡村的侵蚀和腐败，对于乡土自然人性的赞颂和对于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鲜明地规范了沈从文创作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对于乡村的牧歌式的绘画风格的抒情小说，一种是对于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揶揄的讽刺小说。这一点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里说得异常明白：“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沈从文不相信政治，他用传统的“朝野”的概念和官场斗争来理解中国30年代的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他将围绕左翼文学运动所发生的论争理解为无意义的“纠纷”。他拒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诊断。他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习作选集代序》）他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宣称：“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他借用王尔德的话说：“文学之美妙，即在能使不能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沈从文反对将文学作为工具，但是他又极端迷信文学这种工具的社会作用，梦想着以小说为工具进行“经典的重造”，并且“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长庚》）。他明确提出用小说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长河〉题记》）。

鲁迅是中国最早提出“纯文学”这一概念的人之一，但是，鲁迅终其一生所从事的却不是“纯文学”。与鲁迅相反，沈从文是一个明确宣称具有自觉独立的艺术追求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个“文体作家”，一个故事应该尝试几十种不同的写法。对于沈从文那些美得令人心醉的文字，我常常产生一种深深的矛盾与困惑。与另一位被贫穷夺走了创作生命的湘籍作家叶紫相对比，两人的风格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叶紫也许因为缺少“抽象”和“抒情”，也许因为缺少“自然美”和“人情美”，他的存在在沈从文的《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中被过滤掉了。我常常情不自禁地为沈从文作品的美妙所魅惑，同时心底里却又会发生一种无可抒发的愤怒和不舒服的感觉。在我的理解中，对于艺术没有任何崇拜和夸张的巴金，无论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有着多少缺陷，甚至也无论他自己承认不承认是“艺术家”，他都是一位“大作家”。30年代，鲁迅中断了小说创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以生命搏斗的杂文创作中去。鲁迅把他的杂文称为“投枪”和“匕首”，在正人君子们看来，鲁迅的杂文是“骂人的艺术”，是不登艺术的大雅之堂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然而，鲁迅和他的杂文，这才是“诗史”，“诗圣”！

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



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的语言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文字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沈从文能够以一种艺术的眼光而不是道德政治的眼光来看一切，他的创作使一直受到道德、政治的范围和以“风雅”、“风骨”为极致的文学正统获得了某种解放。我以为这正是沈从文的创作具有诱人的别样风致的原因。西方文学的感性特征在他这里比在邵洵美等唯美主义的“肉体诗人”那里得到了更好的表现。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30年代以来，沈从文对于左翼文学充满了冷嘲热讽，因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废物和恶棍，根本不堪一击，于是，沈从文在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中首当其冲。鲁迅公开宣布自己是统治阶级的“逆子贰臣”，他批评京派文学是“官的帮闲”，揶揄沈从文“忠而获咎”。1938年，沈从文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河》第一部和散文集《湘西》。40年代，沈从文更深地

卷入到了政治冲突之中，创作风格发生变化，创作数量明显地衰退。解放前夕，在香港以《大众文艺丛刊》为中心发动了对沈从文的严厉批判。他的固执、善良和怯弱使他对现实的巨变极端不适应和满怀忧惧，从而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并走向自杀。这种对当代中国巨变的无所适从，以及与时代的严重的脱节感，使他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物研究。这也说明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同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一样，沈从文在解放以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生活在异常压抑的气氛之中。他的作品在大陆基本上绝版。同时，与现代作家的命运无二，他的所有作品在台湾都是“禁书”，——一直到1987年“解严”。

物极必反。沈从文曾经被激进的文学制度所排斥，然而，随着反主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崩溃和重新归顺于“世界主流文明”，颠倒过后的历史再一次颠倒过来。随着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沈从文成为了新的神话，同时左翼作家郭沫若、丁玲则似乎不可避免地再一次被妖魔化。反主流的郭沫若和丁玲们是历史上的偶然的瞬间，向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抗争终归失败，而沈从文则代表了历史的“常识”和“势力”，透过这种神圣的历史“常识”和“势力”的不可动摇和终归胜利，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那种温文尔雅和极度节制的语调也难以掩盖的傲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郭沫若、丁玲们当时对此强烈的愤慨。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常识”和“势力”面前，胡也频等人的挣扎和牺牲成为了无意义的“愚妄”和“浪漫”。

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把鲁迅从公共领域降解到私人领域，把历史运动转变为内心事件，把公共政治瓦解为私人道德，把“公敌”转化为“私怨”，把政治的“大是大非”变成了私人的道德纠纷。然而不论怎样把鲁迅“私人化”，也摧毁不了鲁迅的“阶级意识”和“大是大非”，这正如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表明的那样：



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挣扎……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而这就构成了“乡下人”沈从文与“逆子贰臣”的鲁迅的本质区别。

鲁迅、沈从文和赵树理是中国现代三位最杰出的描写农村的作家，但是他们体现了对于农民的完全不同的态度。鲁迅代表了“五四”启蒙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农民的“愚昧”和“落后”的忧患和哀痛。在他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的绝望和麻木。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树理是一个反“五四”和“新文艺”的“文坛”的“文摊文学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真正以一双农民的眼睛来看世界，以农民的思维来思考社会，把从来没有语言的农民的痛苦、欢乐和生活憧憬用大众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他们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形象融入到了现代文学的视野之中。沈从文则在农民的“淳朴”和“愚昧”中发现了“美”。鲁迅说，他曾经把农民看成是花鸟。沈从文对于农村的描写是风格化的，是美丽而又忧伤的田园牧歌。沈从文对于正在崩坏中的古老乡土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他对于农村和农民明显地

是采取一种赏玩的态度。20年前我曾经吟颂过沈从文的名句：“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然而，在那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天崩地陷的大时代里，沈从文如此精致美丽的文字，我们在沉醉和流连忘返的同时也觉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正如朱光潜的美学所指示的那样，美感离不开距离，美感必须摆脱联想。所以，读沈从文最好也是没有历史阴影和联想的在新鲜的阳光下的少男少女们。

由于体例和篇幅的限制，这里没有选入沈从文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边城》和他饶有趣味的《从文自传》。我们只希望本书成为通向更深更美的沈从文的精彩世界的一条登堂入室的画廊。最后要用朱光潜的一句话说：欣赏啊，慢一点走！

2002年10月6日 于清华园

